



中世纪的 中日关系

汪向荣
汪 皓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大视野
文库

◎ 幼狮文化丛书

中世纪的 中日关系

汪向荣 / 著
汪 皓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大视野
文库

◎ 幼狮文化丛书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世纪的中日关系/汪向荣, 汪皓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ISBN 7-5006-4506-6

I. 中… I. ①汪…②汪… III. 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中世纪 N.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4688 号

*

汪向荣 汪 皓/著

责任编辑: 潘 平

装帧设计: 敬人设计工作室

吕敬人+牛明瓛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18359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9×1194 1/32 11.75 印张 5 插页 280 千字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 19.8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前言

我从七八年重操旧业后，曾先后撰述、出版过一系列研究心得，其中独缺中世纪有关两国交涉部分。多少年来，不断有友好及读者垂询。感谢他们的关心，现在我把有关这时代的部分研究心得奉献到大家面前。从时间上说，的确是晚了二十年左右，但我毕竟还在我从事两国交涉史研究六十年、我年逾八十的新世纪之初呈献了此稿，一则想在盛世之初，返顾一下我过去的足迹，同时也为和我合作的长孙女作一良好的开端。

本书中有部分是我长孙女在我笔记的基础上，根据她的史观写的。我披阅并且改删了不少，但在史观方面则一仍其旧，没有作任何变动；相信读者一读本书，即可发见。我不容许他人更动我对历史的看法、论点；同样，我也不会更动他人的论点、史观。当然，她的某些看法、论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不过基本上是一致的。至于论述的方法，那完全是相同的，即以史实为据，决不“以论代史”；也就是说，言必有据，孤证存疑。尽管本书的写作方法和我过去的多少有些不同，不再将所据以作注的方式列出，但这是由于我年事已高，对所述、所记要一一查找出处，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且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以我笔记为据而成的文字。这一点也请读者放心，当然读者愿意，可以根据线索查找，决不会失望的。

本书中所述的中世纪，亦即我国元明之际的中日两国关系。这一段时间在两国历史中是比较繁杂的。不但有元蒙的两次对日战争，还有倭寇之不绝骚扰和日军侵朝和援朝明军相逢于半岛战场。可以说是以战争始，亦以战争终；本书即以此两主要线索为代表。或许有人认为，这一段时间，除作战外，有何交涉可言；但是人世间的关

系是复杂的,历史也不是简单的战争史,而是人民的历史。因为是人民的历史,作为后裔的我们就有必要研究这一段历史,无论是战争也好,和平也好,我们都有必要好好的加以总结、研究,从中汲取教训,这才是“以史为鉴”。

本书中前面部分,也就是元代部分是由我自己根据当年讲授时的录音译出的;后面部分即明代的,我是带了笔记去,准备讲授的;以后由于时间给挤掉而没有能讲,只能把原笔记本带回;现在由我自己根据这笔记用文字写出了部分,而多数则是由我长孙女利用我的笔记写成。

我在按规定停年下岗以后,原来想优游林下、颐养天年的,可是彼邦的学者都希望我利用余年在那里担任博士课程的指导教官,让他们的博士生知道一下不同文化基础的学者在某些问题上的想法。我同意了,并且决定讲授中世纪时的两国关系这课程。我计划每周三次,每次二学时,有十周可以讲毕;所以带了足够讲授十周的笔记本前往。想不到第一堂课下来,这计划就得更改:原来他们为了照顾,把每周三次的课排在一起,也就是一个下午,这样可以少往返之劳,而且讲授时能连接。可是刚上第一堂,几位就读博士课程的学子就提出,以讨论为主,不必讲授。当然我很清楚他们的方式,因为我年轻时就受过这种教育;可是四十年来已习惯于填鸭,几乎忘了这种使自己得益的方式。尽管我这次的任务是讲授两国文化的差异、比较,也不能不同意采取这种方式,决定每周我主讲之后,请他们提出问题讨论。这样进行得很顺利,每个星期至少有两个学时是在热烈辩论中渡过的,上课地点也由教室大楼而移到我研究室。这样的讨论,的确使我获益不少,不但了解了两国文化的差别,而且也知道了新一代人的想法。我的讲义因而短缩了不少,不但原来准备的有关明代部分,一字未讲;连元代的,也少讲了一半。有关元蒙军侵日的原由和五山文化的探讨,实在太热烈、太深入,我想改变原定的进程,是值得的。

这里刊出的是当时我讲授的部分,讨论的情况和结论(假使有的话),并没有收录在内,因为这里只发表我的论点,不涉他人。在这里还需要声明的是,因为对象的不同,所以有不少处所和对国内读者要求的不同。有些对国内读者不需要提的,在这里却一再加以反复;有的需要解释的,却简单的带了过去。我在逐译时,也注意到了,原想加增删,但毕竟年逾八十,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一点和文中出处没有加注,和我过去的习惯不同,其原因都一样,希望读者谅解。不过有一点可以再向大家保证的,就是本书内一字一句,都是有所据的。我从事中日交涉史的研究半个世纪,从不改变我决定的论点,更不会因而篡改或歪曲某些历史事实。这本书,可能是我最终表达我论点的一本,也是我长孙女初次和我合作的一本,相信她也会循着这条道向前的,虽然前途并不平坦。

停了二十年的笔重新握起,要写的很多,但大部分和学术,更和中世纪两国关系无关,所以就打住了。以后有机会谈及杂忆时再说。希望大家和我一样,返观一下过去我走过的路,也预祝我孙女前进。

汪向荣

二〇〇一年春

目录

前言	001
一	“蒙古袭来” 001
二	管军总把印 061
三	天龙寺船 065
四	五山文化 075
五	“老僧亦为避秦来” 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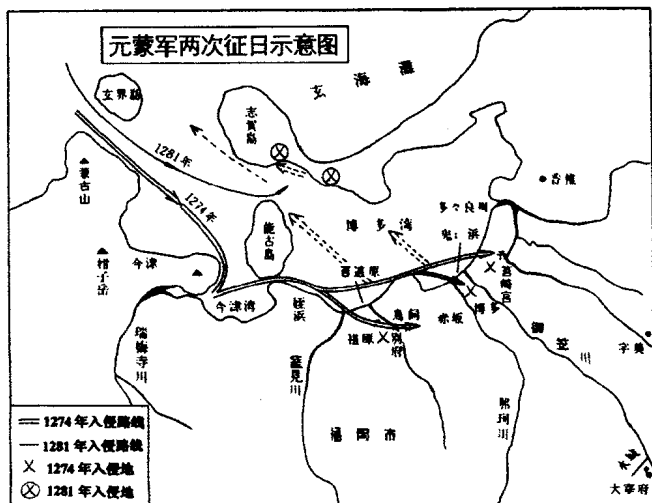
六	遣明船	097
七	足利义满的中国情	169
八	臣日本国王	179
九	遣明船的利润是多少	195
一〇	勘合	207
一一	宁波争贡事件	217

一二	争贡事件对明代日本研究的影响	239
一三	倭寇	253
一四	抗倭援朝	291
一五	一场闹剧	325
一六	明遗民在日本	347
后记		365

一 “蒙古袭来”

中日两国是近邻,邻里之间发生一些冲突、不愉快的事是免不了的,何况两个国家在长时间中,很可能发生冲突而动干戈的。中国和日本,不要说近现代,就在古代和中世纪时,也曾发生过战争。这些战争,不但给当时两国的国力上造成了损失,也给两国国民的思想感情上留下了阴影。尽管因为时间的推移,后代人对历史上的事情已逐渐淡忘或者已经忘却;可是,历史毕竟是永远存在的,而历史给人的教训,也不会因时间而消失。现在我们,包括日本人民在内,对于二十世纪发生的战争,当然记忆犹新,不会忘记。可是对上个世纪发生的甲午战争(日清事变),印象已不深了;至于发生在中世纪,也就是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间的一系列战争,恐怕除了历史工作者以外,一般的都已十分模糊,不一定记起了。即使历史工作者,除了专门研究者以外,也不一定完全清楚。可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推本溯源,和近现代之间是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近现代日本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对同在东北亚地区,文化、生活上都相近的中国和朝鲜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其思想根源,不能不远溯到过去。为了今后我们两大国家,甚至包括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在内,能友好相处,有冲突也不致于大动干戈。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民族之间,不要再存在侵略的野心,探讨一些发生在我们之间一系列战争是必要的。由这些战争发生的原因和结果中汲取教训,从而避免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因为这样,单研究二十世纪两国间,甚而三国间(中、日、韩)发生过的不愉快事情是不够的,必需把目光向前移,尽管中世纪离我们生活的年代已远,但是这些教训还是很现实的。举个例子吧,元蒙军自恃强大,再加上高丽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不顾军事上三大要素天时、地利、

○元蒙军两次东征示意图



人和而突然发兵侵略日本；丰臣秀吉也觉得自己强大，倾全国之力，入侵朝鲜，企图由此入明；可是，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都掉进了人民反抗的泥沼。这和二十世纪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行动有什么不同。

历史是有一定规律的，当然历史不会重复，可是其规律是不会改变的。今天我们研究历史，就是要研究和探讨其规律，所谓汲取历史教训，也是指要从规律中取得教训，而不仅仅是从历史事实中汲取。否则，中世纪离我们生活的现在那么远，不要说武器装备上已大不相同，就是人的素质、习俗上也已完全改变，不要说元蒙军在九州所遇到的“神风”不可能再现；就是侵朝丰臣军入朝后，不到一月而占其半壁江山，俘其王子、大臣的事，也难再见。可是侵略必败，人民的力量是强大而不可忽视这样的规律，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重提中世纪两国间曾经发生过的不愉快旧事的所以。

另外，还需要提一下的是，这些都是历史，都是我们祖先干的事。对于历史上的事，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加以隐讳，更不必加

以曲解。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在中国儒家有“为长者讳”的习惯，可这是这不是对史官、研究历史的人的要求。在中国，史官的工作是记载真实。历史上有多少史官，为了记载真实，说真话，不肯曲解而用生命的代价来护卫的。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那不是史学工作者干的事；我们研究历史，一定要坚持研究真实的历史。这是一次发生在十三世纪时中日两国间的战争，或者说是发生在蒙汉军、高丽军和日本武士间的战争。那时候，元朝还没有建国，只能称蒙古，因此在日本有称这次战争为“蒙古袭来”的，也有用两次作战的纪年命名，而称之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的；不过在中国，向来就以“元寇”名之。

这两次的战争，都是蒙古贵族以强大的武力，胁迫被其征服的高丽共同越海侵略一个无论在武力方面或国力方面都柔弱的日本的战争。当时蒙古族的武力，正横行世界，第一次发动侵略军渡海时，南宋还没有被攻下；而第二次侵日时，不但南宋已灭亡，而且元蒙军已把降服了的南宋军队当作远征的主力渡海使用了。蒙古统治者认为，在这样强大的武力面前，肯定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小小的日本还不唾手可得。然而错了，一次既没有人民支持，更不用说受被侵国人民抗拒的非正义侵略战争，很快就以失败告终了。事实就如此，横扫几大洲、征服了汉族和朝鲜族的元蒙军铁骑，竟没有能征服这东亚的小国日本。

中日之间发生过不少次战争，不管是中国侵略日本，或是日本侵略中国，其战场都不在日本本土；惟有这两次元蒙军的侵略是侵攻日本本土；而且也是在日本本土上侵略军几乎全军覆灭，并结束了战争的。日本的一般老百姓，大概也只有这二次，才亲自经历到侵略军的残暴。

元蒙军用兵的原因

在长达八年之久，元蒙军两次动员大量兵员、船只远征日本，究竟为什么？

关于元蒙军的两次征日，应该从时间上加以区别。元朝是至元八年（1271 日文永八年）十一月建号的，而其准备进攻日本，遣使赵良弼到今津也是在这一年。可是在这以前，不但有使者到对马，而且还有高丽使者持蒙古牒状到大宰府。因此，其侵日的决心、准备都早在建元以前，还在称“蒙古”的时期；同时，其第一次征日时的主力也称“蒙汉军”。尽管第一次征日，已在其建元之后，但当时南宋还在抵抗，所以应称为“元蒙军”。第二次征日是至元十八年，即 1281 年，日弘安四年，那时南宋已亡，在中国大陆上惟一的王朝就是元朝，这次入侵才是元师的东侵。由于时间的不同，所以两次征日的目的，多少有些不同，在探究其原因时应加区别。

蒙古民族是个善于征战，而且有征服其他民族、扩张领土的野心。成吉思汗率部东征西战，横行在欧亚大地上，其目的就是满足其建立世界大帝国的野心。成吉思汗出身于一个原始部落，谈不上有什么战略思想，只凭其勇猛向前的精神，以暴力威压，征服了一批力量不如蒙古民族的部落、国家。但到其后人就不同了，在长期的征战生涯中，使他们明白和懂得了战略思想和作战的战术、方法，以逸待劳，以少胜多乃至应用迂迴作战、声东击西或围而不攻、待其自毙等过去他们所不懂也不用的战术，忽必烈就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个优秀的指挥人才。过去在探讨元蒙军侵日的原因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而认为元蒙军的入侵日本，还和其征服其他欧亚各地一样，是满足蒙古民族的侵略野心，征服的欲望。以为其在征服各地，建立一世界大帝国时，决不能容许在其腋下有一不属其统治的国家存在。

当然也有认为元之征日，是在考虑到日本和南宋有贸易往来。怕在征宋的时候，日本会援助南宋，从而拖延其灭宋的时日。而日本学者长村鉴更在其所著的《蒙古寇记》中说：“当斯时，天若帮助宋朝，使理宗（蒙古军攻宋时，南宋的皇帝）能正君道，选贤能，任将相；注重于内治外御，再结合我（日本）、高丽，东西连衡，协力抵抗出击，则必使蒙古军腹背受敌，转战东西，消耗兵力，最后无法得逞于天下，致天下

大事去矣。”最后，长村作结论说：“呜呼！世祖之得天下，可谓其志锐，其力强，而其术亦尽焉！”在这段文字里面，他是充分的估计到了忽必烈的想法。

更有人主张，元军之征日其目的在掠取日本的金银财宝。例如有名的马哥孛罗，在其以留华期间的见闻而写的《东方见闻录》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明他对元蒙军侵日原因的剖析。他说：

日本（Zipangu）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陆一千五百哩。其岛甚大，岛上居民是偶像教徒，自治其国。岛上据有黄金，其数无限，盖其所属各岛均出金，而其地距陆甚远，故商人很少到那里，以致该地金多无量，也不知何用。

此岛君主有一大官，其顶都用精金修造，与我辈在修造礼拜堂时用铅相同，因此，其价值难以估计。此外，官廷房屋地下所铺，都铺金砖以代石板；屋中一切窗户，也都用精金铸造。由此可知，此宫殿之富无限。……

还多宝石珍珠，珠色如蔷薇，极美；价值亦甚巨。珠大而圆，与白珠之价相等。（见冯承钧译《马哥孛罗行记》）

马哥孛罗是当时少数到过亚洲、主要是中国的欧洲人，他所写的不过是根据部分所见，多数还是得诸传闻，不足为凭；但有的学者却就加以引用，作为根据。例如日本的森克己就这样说：“世祖东征日本的目的，并不止于满足其征服欲望，而是想使日本向中国朝贡其产量丰足的黄金、水银、真珠和硫黄等。”

在谈到元蒙军征日的目的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都有一定的根据。可是，如果从当时所处的国际局势和蒙古崛起以来，其首领自成吉思汗直到忽必烈所用的战略来看，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些理由都只是表面的，根本的目的决不止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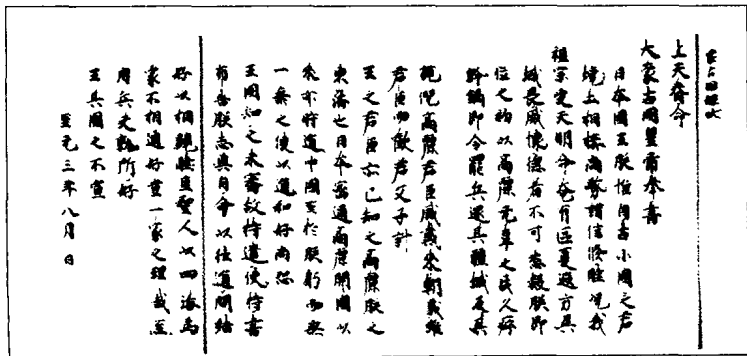
满足其征服欲望，这是最大的目的，也是最初的目的。

蒙古奴隶主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依靠其强大的武力，征服和扩

大了其领地之后，就把目标置于当时统治着亚洲大陆中原的宋。特别是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其继承者在和林会议（1235年）时，就决定攻宋和入侵高丽、印度及欧洲。这决定次年就付诸行动，当时，他们的战术特点是尽可能以利用其部队，主要是骑兵的特点，行动迅速、敏捷，所以他们作战的特点是不打硬仗，打不下就退；避实就虚，采取迂迴形式，包围敌人，以便等待有利时机，一举而消灭敌人。对于南宋，他们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战略。

当时南宋虽偏安一隅，但仍具有一定的实力；加上南宋所在的平原地区，湖港交叉，驰骋草原的骑兵无从发挥其优势。所以在元军攻金的时候，就采取迂迴包围、避实就虚的战术，剪除金的周边国家，于1227年攻灭了西夏之后，采取利诱南宋，与宋联合攻金，以致金于1234年亡于宋蒙联军。

蒙古决定南下攻宋之后，就采取先以全力攻取中亚和欧洲，到征服占领之后，再转旆东征，以孤立南宋。1241年征服了高丽，1253年灭亡了大理国，征服了吐蕃，把南宋周围的各民族地区尽收在其麾下；然后在1257年（宋理宗宝祐五年，蒙古宪宗七年），动员全部力量大举攻宋。不久，虽因蒙古统治者内部纷争而暂停；但不久，内乱平定，忽必烈继位后，于1271年（南宋度宗咸淳七年，元世祖至元八年）建号为元，并且继续南下攻宋。



在攻宋的同时,蒙古贵族、奴隶主们考虑到南宋可能从海上得到一些周边国家、民族的援助,这样就会延续南宋的抵抗,拖长蒙古军灭宋的时间。而高丽虽在1231年蒙军入侵之后,因无力抵抗,而于1241年投降称臣。但高丽的投降,只是迫于蒙军的压力而已;一旦压力轻减,高丽军民就起而反抗;时服时叛,使蒙古贵族感到困惑。蒙军决定大力攻宋时,为防止朝鲜半岛上来的阻力,所以对之也加强了统治。1272年,即在大举南下攻宋时,在高丽的蒙军,也用全力讨伐以全罗道的珍岛为根据地、与侵入蒙军进行武装周旋的三别抄军。三别抄军在无法抵御蒙军的猛攻、珍岛沦陷之后,又退到济州岛继续抵抗;最后,蒙军又占领了济州岛,全部平息了高丽的反抗,并将济州岛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在收平三别抄军的时候,蒙军已经下决心收缩对南宋的包围圈。在过去四次遣使到日本的行动失败之后,又于1271年(元至元八年,南宋咸淳七年),即大规模讨伐三别抄军的同时,派遣陕西路宣抚使赵良弼为使,经高丽前往日本诱降。良弼一行于次年正月,因日本大宰府拒绝其要求而回到高丽;他一面修书报告朝廷,由陪同出使的张铎送回,而良弼本人则仍留在高丽以待后命。四月,张铎回高丽;不久,赵良弼又前往日本,这次逗留的时间较长,大约有一年左右。这次东行的结果如何,因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留下,所以无法得知。一行于至元十年(日文永十年,1273)回国;五月,谒见世祖忽必烈时,曾提出一份详述日本情况的报告,其中包括日本国州郡名称、数目、日本君臣的爵称、名字和风俗习惯等,从而使元世祖称其不辱使命。

就在忽必烈得到这份有关日本情况的详细报告之前,朝鲜半岛上的三别抄军之乱已被平定。这样元蒙军所计拟的对南宋的包围圈,除了远在海外的日本以外,都已全在掌握之中;也就是说,只要日本能被征服,对宋的包围圈就可完成;这样,南宋除称臣或灭亡以外,再也没有逃亡或待援的可能。也就是说,元蒙远征入侵日本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有至元十一年(南宋咸淳十年,1274)元世祖忽必烈下

令远征日本之举。

由此可知,元蒙军第一次远征的目的,不一定是掠取日本列岛上的金银珠宝,而是在完成其征服世界的野心,完成其对南宋的包围圈,阻止南宋可能接受的外援和出逃。

这次元蒙军的远征是失败了,但是其对南宋的攻略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1276年,即元的至元十三年和南宋端宗的景炎元年,南宋的首都临安被攻陷,使南宋王朝成了一个流亡的机构。这样,到1279年,终于灭亡。

元蒙军第一次的远征日本,目的是完成其对宋包围的战略意图;可是,到宋灭亡以后的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日弘安四年),元蒙军又一次发兵远征,其目的和原因又何在呢?显然,和第一次远征是不一样的。

当然,那时候宋已灭亡,元朝已统一中原,其征服中原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可是,由于蒙古民族缺乏人才,特别在治国方面缺乏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所以在蒙古王朝以武力取得中原、灭宋之后,并不从事抚辑流亡、发展生产,反而制造各民族内部及相互间的矛盾,从而激起统治区内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的反抗。

蒙古贵族、奴隶主在攻克一地以后,对于其原有的武装力量,都加利用,使其编入元军,帮围攻略,征服其他民族或城市;例如元蒙军在西征的时候,曾利用在东南地区收降的汉人武装,共同参与杀掠、攻略。这种手段、方法,在其没有统一中原的时候,还多少有些欺骗性;但到后来,尤其是蒙古奴隶主决定南下攻宋的时候,由于都是汉族,加上元蒙军在攻下一城市之后,对于当地汉族人民的烧杀掳掠十分惨烈、残酷,不能不引起同属汉族的“新附军”等的不满和反抗。蒙古奴隶主在灭宋以前,认为中原各地的人民,主要是汉族人民,都不好控制,无补于国,因而对之采取了“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做法,以后虽有所改变,但仍然歧视汉人,尤其是对于在战争中投降的武装分子名之为“新附军”,目为不安定因素。对于他们,蒙古奴隶主是不放